

民国文献
辨伪学研究

佟大群 著

民国文献
辨伪学研究

佟大群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/ 佟大群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8. 5
ISBN 978 - 7 - 5203 - 2315 - 4

I. ①民… II. ①佟… III. ①文献—辨伪—研究—
中国—民国 IV. ①G256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3660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安 芳
责任校对 张爱华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8.5
插 页 2
字 数 301 千字
定 价 7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出版资助成果

前言

一 研究综述

民国时期在中国文献辨伪学研究史上，是一个异样活跃的历史阶段。民国文献辨伪学，是一个颇受关注的学术论题。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，国内外许多学者，均究心于此，从史学史、学术史、文献学等角度，进行了深入探讨。时至当下，各类论著，已数以百计。其中许多观点，均卓有见地。今择其梗要，评述如下。

（一）文献学论著中的有关评述

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，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。目前出版的此类论著，已不止数十部。其中，如张舜徽《中国文献学》（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）、孙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（中华书局 1994 年版）等，或在研究综述中，或在专门章节中，都曾述及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。此外，较有代表性的，一是杨绪敏的《中国辨伪学史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修订版）；二是拙著《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）；三是刘重来在《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述略》（《历史研究》1996 年第 6 期）一文中，也曾纵论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，并评述顾颉刚等人所取得的学术成就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国内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，成就较为突出，尤其港台地区的学者。其中，既有系统的理论总结，也有扎实的资料辑录。譬如，林庆彰的《清初的群经辨伪学》（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），虽然以清初学者的经籍辨伪为主旨，但是，林先生的视角、方法，对本论题的深入探讨，不无借鉴意义。郑良树在《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》（《文献》1990 年第 2 期）一文中，就如何评述民国文献辨伪学史，提出许多

2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

富有价值的论断。此外，郑良树的《续伪书通考》（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），是继民国时期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之后，又一部文献辨伪资料汇编，可令后学省去不少为辑录史料而翻箱倒箧的烦琐。其他如屈万里、余英时等人，只言片语，都有见识。限于篇幅，兹不赘述。

文献辨伪，从来就不是单纯的“文献整理”问题。但是，从学术史、思想史等角度，探讨该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。值得关注的，有路新生的《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），以及张京华等合著的《二十世纪疑古思潮》（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）。前者旨在探讨近三百年来中国疑古思想之始末，其中涵盖民国初年的部分内容；后者则将考察重点，聚焦在一度激荡民国学术的“古史辨”运动。近年来，人们对“疑古辨伪”的反思，尤其全面深刻。其中如伍铁平的《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》（《学术界》2003年第1期）、杨善群的《论古籍辨伪的拨乱反正》（《学术界》2007年第4期）均从各自视角，切入该论题。个别批判，不乏尖锐之剜切。

（二）1949年以来对“古史辨”的反思

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，近20年间，以胡适、顾颉刚、钱玄同及其再传弟子为主体的“古史辨”^①，曾在中国学术界扬名立万。其延续时间之久，涉及领域之广，关联学者之多，都未见匹敌。

“古史辨”的学术，基本不超出“疑古辨伪”的范畴。顾颉刚等“古史辨”学人，除了究心于“史事”“传说”等真伪虚实的考辨之外，也对诸如《古文尚书》《周礼》《诗序》等传世文献的真伪是非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，并发表了大量“勇猛”且“骇人”的言论，致令“冤假错案”在在皆有。其流风余韵，绵延至今；有关批驳，也不鲜见。因此，“古史辨”的文献辨伪，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献辨伪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史、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作为“古史辨”的领军人物，顾颉刚先生如何认识和评价他们发起的“文献辨伪”呢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，顾颉刚就坚持通过“文

^① 《古史辨》是“古史辨”的论著汇编。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，相继有朴社、上海书店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海南出版社等多个版本。海南出版社的本子，印行时间不长，较为易得，本书引据，多依此本，特此说明。

献辨伪”，实现“批判继承古文化”的客观必要性：“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”，因此“《古史辨》的工作还该完成”。^①言下之意，“辨”与“不辨”是一回事，“辨对”与“辨错”是另一回事。20世纪80年代，顾颉刚在发表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？》一文中，再次强调指出，《古史辨》承接宋、清以来之统绪，以考证的方式，“发现新事实，推倒伪史书”。^②顾先生所言，意在强调“古史辨”的辨伪，秉中国文化传统之精神，承中国古代学人之余绪，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工作。

对“古史辨”的文献辨伪成就，表示理解、认同、赞赏的学者，不乏其人。如顾颉刚女儿，即顾潮女士，曾言：“（顾颉刚）先生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《古史辨》，创立了‘古史辨派’，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影响历久不衰。”^③曾著《古史续辨》的刘起釭先生，也对顾颉刚先生大为激赏，称其为“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”，并“开启新的史学之门”。^④顾颉刚的另一个女儿顾洪女士，也对“古史辨派”的文献辨伪研究，给予了“理解之肯定”，她说道：“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……疑与信是站在不同立场上解释古史。”^⑤言外之意，顾颉刚等“古史辨”的文献辨伪，其学术论辩之初衷，其对中国古史研究之贡献，都无可厚非。

胡绳在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，从史料的辨伪和整理的角度，对顾颉刚先生等文献辨伪暨古史考辨的贡献，称赞道：“所谓‘层累地造成的古史’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，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，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。……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

① 顾洪编：《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》第3编，《〈古史辨〉与史料学》条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51页。

② 顾颉刚：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？》，载顾颉刚《我与〈古史辨〉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16—217页。

③ 顾潮：《顾颉刚先生小传》，载刘梦溪主编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顾颉刚卷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页。

④ 刘起釭：《序》，载顾潮、顾洪《顾颉刚评传》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3页。

⑤ 顾洪：《探求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》，载顾颉刚《我与〈古史辨〉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6页。关于“古史辨派”的提法，林甘泉等学者并不赞同。林先生在一次访谈中，曾指出：“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，顾颉刚的弟子有些意见跟他一致，有些并不一致，方法上也未必完全一样，只能说疑古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。”参见沈颂金《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——林甘泉先生访问记》，《文史哲》2003年第2期。顾颉刚自己也曾说道：“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。”见顾颉刚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？》，载顾颉刚《我与〈古史辨〉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16页。因此，本书一般不采用“古史辨派”的提法。

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个有用的钥匙。”^①

与此同时，胡绳又指出：“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‘古史辨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，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‘疑古’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。”^②胡绳的评述，并非溢美之词。如上文所述，顾颉刚及“古史辨”学者的“文献考辨”，确实是要在文化、思想上，对“封建主义”，作一个全面彻底的“清算”。

裘锡圭先生从“疑古思潮”与“古典学”关系的角度，评估“古史辨”的贡献。其言：“从20年代到30年代，疑古逐渐成为古典学界的主流思潮，传统的古典学在很多方面受到清算。经书的神圣外衣完全被剥除，很多先秦古书的年代被推迟，有不少书被看作汉以后的伪作（这里所说的书包括书中的单篇）。虽然怀疑古书之风早就存在，但是只是到了这一次才发展成主流思潮，怀疑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以往，从而明显地改变了古典学的面貌。”^③

裘锡圭先生的言辞较为和缓，但提出的问题却较为尖锐：“古史辨”对传世文献，特别是维系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之根本的《尚书》《周礼》等，进行“清算”，从而“明显”改变了“古典学”暨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。

对此，时人徐旭生先生，也曾言及：“古史辨”的“最大的功绩”，就是把在古史中的“最高权威”，即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《皋陶谟》《禹贡》三篇的著作年代，“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（初写在春秋，写定在战国）。……由于疑古学派（广义的）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，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，把盘庚以前的时代叫作传说时代，以后的时代叫作历史时代”。^④

① 胡绳：《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：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》，载陈其泰、张京华主编《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》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97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裘锡圭：《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》，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》（2）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页。

④ 徐旭生：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（增订本）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3页。据徐先生自序，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初版成于抗战初年，后有增订。徐旭生先生，生于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，早年留学法国，1919年学成回国。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北京大学教务长（1926年）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（1927年）、国立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（1929年）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研究员（1932年）、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（1937年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先后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。徐旭生回国任教之时，正是顾颉刚等在校求学之际。徐先生生逢其时，对“新文化运动”及“古史辨”都有深刻体悟和见解。

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讲,对“古史辨”学者的“文献辨伪”研究,只作“单纯的”文献学解释,无论如何,都会停留在表象之描述,而不能触及问题之实质。这是“文献辨伪学研究”中,最值得关注,也是最需要避免的问题。

此外,著名史学史专家陈其泰先生,在谈到“古史辨”的学术贡献时,特别强调了他们的“求真”精神与“平等”讨论的态度。^①这种精神与态度,与顾颉刚等“古史辨”学者的文化理想和学术追求,息息相关,应结合起来,作全面系统的诠释。

严格地说,“古史辨”的疑古辨伪,是致力于弘扬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的“疑古辨伪”,其与古代学人为维护“圣道治统”而进行的疑古辨伪,“殊途”且不“同归”。因此,顾先生所谓“继往开来”的观点,是值得斟酌的。

故而,民国以来,对“古史辨”的文献辨伪,提出异议、质疑的学者,一直不在少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顾颉刚等学者及其学说,长期以来,都为政府及学界所尊重。公开批评“古史辨”文献辨伪成就的言论,并不多见。改革开放后,批评的声音多起来。其中,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。

20世纪90年代,李学勤针对“疑古思潮”,提出了“走出疑古时代”的观点。1992年,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,作了题为“走出疑古时代”的发言。发言稿刊发在《中国文化》第7期上。两年后,李学勤出版了题为“走出疑古时代”的论文集。1997年,又刊行该论文集的修订版。其中新增两篇——《谈“信古、疑古、释古”》《对〈走出疑古时代〉的几点说明》——文章。1998年9月,李先生在北京召开的“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”上,又作发言。该发言经整理后,以《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》为题,发表在《中国文化研究》1999年第1期上。

李先生认为,现当代学者,应从弥漫的“怀疑风气”中走出来,对古老传说多一份尊重,对传世文献多一份信任。其观点,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。李学勤先生的“走出疑古时代”,虽然不仅仅针对“古史辨”的“文献辨伪”而发。但由于文献辨伪,确确实实在“古史辨”的学术研究

^① 陈其泰:《“古史辨派”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》,载陈其泰《史学与民族精神》,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,第527—549页。

中，占有相当重要的篇幅和地位。因此，有关民国时期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回顾，李学勤先生的论著及观点，都值得深入体味。

此外，作为与胡适、顾颉刚同时代的钱穆先生，晚年也曾对“古史辨”的疑古辨伪，再次提出批评。其言：“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，则中国人专务伪造，又成何等人。”^① 其评价之倾向极为鲜明。

“古史辨”学者如钱玄同、顾颉刚等，承今文学家之余绪，论定《左传》《周礼》都是伪书。对此，杨向奎、杨伯峻等后辈学者，都曾作出了批驳和回应。以“《左传》伪书说”为例，杨向奎曾撰文指出：“《古史辨》在冲破伪的古史方面，在由怀疑古史而加以抨击时都发生过积极作用。但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头，以致玉石俱焚，比如《左传》是一部好的古代史，但他们怀疑它是伪作，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，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《左传》不伪。”^②

杨伯峻在仔细研究了《左传》本身和战国、西汉的流行情况后，也认为它成书年代在公元前403年以后，公元前386年以前。^③ 胡念贻对《左传》本身也作了透彻研究，从助词的用法着手，认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是用鲁国方言写的，称为“鲁语”。他说《左传》“作于春秋末年，后人虽有窜入，但它还是基本上保存了原来面目”^④。经过上述学者的考订，可以证实《左传》确为先秦古籍。

（三）考古学新发现的纠偏补正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遗址，在全国多地被相继发现。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我国的考古发掘，又有一系列新的重大发现。特别是一大批简帛文献的出土，诸如《老子》《孙子》《六韬》《尉繚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鹖冠子》《文子》等曾被世人证伪的文献，重见天日并被革去伪书之谤。

① 钱穆：《维新与守旧——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》，《幼狮杂志》（台湾）1980年第12期。

② 杨向奎：《论“古史辨”》，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《中华学术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28页。

③ 杨伯峻：《〈左传〉成书年代论述》，载杨伯峻《杨伯峻学术论文集》，岳麓书社1984年版，第225页。

④ 胡念贻：《〈左传〉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》，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《文史》第11辑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1页。

对此，李学勤有言：“近20年来，各地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战国、秦汉时期的简帛佚书，经过学者们整理研究，证明‘疑古’思潮中的‘辨伪’，有好多是不正确的。”^① 又言：“最近这些年，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。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‘珍本秘籍’，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。事实证明，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‘冤假错案’，有必要予以平反。”^② 郑良树先生曾言：“就古籍辨伪而言，竹简帛书出土所带来的震撼，恐怕与古史辨学派新说的震撼不相伯仲。”^③

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，证传世文献“不伪”，一时间成为文献辨伪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。在“证真”过程中，人们再次对存世文献之真伪，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辨伪学史，进行了深刻反思。

20世纪初年，诸子学勃兴。老子其人及《老子》一书，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。梁启超、钱穆、冯友兰等人，认为《老子》成书于战国中晚期。其中，顾颉刚的观点更显激进：“在《吕氏春秋》著作时代，还没有今本《老子》存在。”^④ 由是，“《老子》晚出说”，一时盛行。

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，有《老子》甲乙两本，均抄写于秦汉之际；1993年，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竹简，有《老子》甲乙丙三组抄本。裘锡圭据此认为：“把《老子》形成的时代定在战国早期，还是比较合理的。”^⑤ 出土简帛证明，老子确实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物，“《老子》晚出说”被推翻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臆兵法》的成书年代及真伪，自南宋以来，疑者日众，聚讼纷纭。进入20世纪，梁启超在评估清儒辨伪成就时指出，“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，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，尚未解决的十

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：《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791页。

② 李学勤：《谈“信古、疑古、释古”》，载陈其泰、张京华主编《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》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66页。

③ 郑良树：《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（代序）》，载郑良树《诸子著作年代考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页。

④ 顾颉刚：《从〈吕氏春秋〉推测〈老子〉之成书时代》，载罗根泽编著《古史辨》第4册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18页。

⑤ 裘锡圭：《郭店〈老子〉初探》，载陈鼓应主编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7辑，三联书店1999年版，第30页。

之六七”^①。就《孙子》十三篇而言，梁启超认为，该书“旧题孙武作，不可信。当是孙臆或战国末年人书”^②。钱穆也主张：孙武“其人与书，盖皆出后人伪托”^③，又称“孙臆之称，以其臆脚而无名，则武殆即臆名耳”^④。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也认为孙武和孙臆实际上是同一个人，《孙子》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孙臆。武内义雄亦然其论。^⑤ 上述观点，几成定谳。

1972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，出土了一批竹简，年代约为西汉初年，其中有《六韬》《孙子兵法》《尉繚子》《孙臆兵法》等篇。从而证实了孙武、孙臆都确实存在，并各有兵法传世。郑良树根据地下出土资料，认为：“《孙子》十三篇作成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末年，战国早期（战国始年以《史记》为准），也就是大约孙武卒后的四十余年。”^⑥

杨伯峻则主张：“我认为《孙臆兵法》的编定，和一些先秦的其他古籍一样，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。自然，也不必排斥这样一种推断，即《孙臆兵法》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孙臆的原著，最后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。但无论如何，编定的年代，当在孙臆死去以后了。”^⑦

《古书辨》中没有专门讨论《孙子兵法》的文章。但据《顾颉刚书话》可知，直到1972年前后，顾颉刚先生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：《史记·孙武传》全不可信；《孙子兵法》决不作于春秋时，而成书于战国时期；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想必是孙臆。^⑧ 据学者考证，顾颉刚先生对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臆兵法》一事，是了解和掌握的。但依然没有将其运用到文献辨伪中来，这实在是“20世纪学术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一件憾事”^⑨。

《文子》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传世文献。近代以来，多有学者承袭唐宋

①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新校本）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，第313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312页。

③ 钱穆：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卷1《七、孙武辨》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，第14页。

④ 钱穆：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卷3《八五、田忌邹忌孙臆考》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，第305页。

⑤ 转引自郑良树《竹简帛书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53页。

⑥ 郑良树：《论〈孙子〉的作成年代》，载郑良树《竹简帛书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72页。

⑦ 杨伯峻：《孙臆和〈孙臆兵法〉杂考》，载杨伯峻《杨伯峻学术论文集》，岳麓书社1984年版，第193页。

⑧ 印永清辑：《顾颉刚书话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61—165页。

⑨ 张京华：《顾颉刚与考古学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8年第2期。

学者旧说，视其为伪书。章太炎说道：“今之《文子》，半袭《淮南》，所引《老子》，亦多怪异，其为依托甚明。”^① 胡适也认为：“《文子》实伪书，只可算是一种《淮南》节本。”^② 1973年，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葬（汉宣帝元凤二年，即公元前56年），出土了一批简牍，其中有《文子》残简，与今本《文子》相似，且有今本《文子》不见之佚文。^③

整理者对竹简本与今传本《文子》作了认真比较。^④ 定州汉简《文子》虽为残本，但说明至少在汉初，《文子》就已存在。据此，李学勤认为：“今本《文子》至少一部分还是真书，过去全加否定，实在是冤枉了。”^⑤

经宋、清学者考订，《孔子家语》是“王肃”伪作，几乎成为定论。顾颉刚同样认为：清人王柏所言的“王肃杂取伪托”说，“绝对正确”^⑥，《孔子家语》不但是“一部伪书”，而且是一部“杂凑书”^⑦。1977年，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木牍文书中，许多语句在今本《孔子家语》中可以见到。李学勤据此认为：“早在汉初确已有《家语》的原型，《史记》世家、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。刘向編集《说苑》，也收录了其中文字。王肃作解的今本《家语》，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。”^⑧

胡平生也根据阜阳汉墓木牍和《说苑》简的材料，讨论了《家语》的真伪及成书年代，结论为：《家语》在流传过程中，有亡佚、改易、增益等各种情形，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，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书。^⑨

① 转引自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17页。

② 胡适：《淮南王书》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，第12页。

③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：《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8期。

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：《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〈文子〉的整理和意义》，《文物》1995年第12期。

⑤ 李学勤：《世纪之交与学术史研究》，载李学勤《重写学术史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29页。

⑥ 顾颉刚：《王柏〈家语考〉》，载印永清辑《顾颉刚书话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13页。

⑦ 顾颉刚：《战国秦汉间人在造伪与辨伪》，载王煦华编选《古史辨伪与现代史学·顾颉刚集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68页。

⑧ 李学勤：《简帛与汉初学术史》，载李学勤《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70页。

⑨ 胡平生：《阜阳双古堆汉简与〈孔子家语〉》，载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《国学研究》第7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543—544页。

1994年,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,其中《孔子诗论》中有孔子对《诗·召南·甘棠》的解说,将之与《孔子家语》相比较,两者基本接近,因此朱渊清确信,《孔子诗论》是孔门弟子所记的孔子《诗》说,《孔子家语》则很可能就是在《孔子诗论》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“钞撮编成”^①。《孔子家语》王肃伪托说,也被彻底推翻。

此外,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卷前佚书《黄帝书》中,亦有不少与《鹖冠子》相同或相似的语句,说明《鹖冠子》的著作年代不会晚于秦代。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,其中根据汉简的简型、内容和字体等,被认定为《六韬》的竹简共有144枚,证实了《六韬》决非伪书。^②

除了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,人们在对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中,又发现古书体例中的诸多规律。有学者将其归纳如下:

(1) 古书不题撰人;(2) 古书多无大题,而以种类名、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;(3) 古书多以单篇流行,篇题本身就是书题;(4) 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;(5) 古书往往分合无定;(6) 古书多经后人整理;(7) 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;(8) 古人著书之义强调“意”胜于“言”“言”胜于“笔”。^③

于是,诸如佚失无存、名亡实存、后人增广、重编合卷、篇章别行、异本并存等现象^④,自会常见。因此,根据撰人、篇目、卷帙、附益、增饰等,遽尔论定传世文献之真伪,是武断且不符合古书体例之实际的。

此外,对诸如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,证明了《尚书·禹贡篇》对九州的区域划分,自有其根据,从而修正了20世纪初年以来,部分中国学人对《禹贡篇》的盲目质疑。^⑤

① 朱渊清:《从孔子论〈甘棠〉看孔门〈诗〉传》,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《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,第130页。

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〈六韬〉的整理及其意义》,《文物》2001年第5期。

③ 李零:《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》,载李零《李零自选集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22—57页。

④ 李学勤:《对古书的反思》,载李学勤《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,第79—85页。

⑤ 参见徐旭生《尧、舜、禹》(上),中华书局编辑部编:《文史》第39辑,中华书局1994年版,第1—26页。邵望平:《〈禹贡〉“九州”的考古学研究》,载苏秉琦主编《考古学文化论集》(二),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,第28页。

总之,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学新发现,对包括文献辨伪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思想,都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。

二 理论与方法

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殊且重要的文化现象。其中,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、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、林林总总的历史事件,碰撞交织,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在其间,任何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,都是时代主题、社会变迁的演绎和呈现。

通过上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回顾,不难发现,既有的“文献辨伪学”类论著,在剖析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辨伪学现象时,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:对个别学者的方法、几种论著的优劣、个别文献论定的是非等,只作“单向度”的梳理和总结,而普遍缺少文化史、思想史、社会史等维度的关照。

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,除了文献真伪的甄别之外,还涉及思想、学术、文化、社会、历史、现实、经济、政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。因此,对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进行研究,需要综合运用文献学、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等多种理论方法。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活动,是理论与实践、思想与学术、历史与现实等诸多辩证关系的汇聚与凝结。要想全面深入剖析这段文献辨伪学发展史,必须对上述关系,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。基于这种考虑,本书拟采用以下理论方法。

(一) 历史唯物主义

研究中国辨伪学史,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。20世纪20—40年代,各种学说在中国盛行,人们的价值取向迥异。在这样的时代及社会背景下,胡适、顾颉刚、钱穆、张心澂等学者的文献辨伪,在考辨方法、判断标准、指导思想等方面,均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后来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评价,也见仁见智,褒贬不一。笔者认为,要想系统梳理民国文献辨伪学史、全面掌握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就、正确评价当时学者的理论观点及主张,非常有必要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。

（二）文献学的方法

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，除《辨伪丛刊》《伪书通考》以外，其研究成果，更多地散见于“不以辨伪为职志”的论著当中。仅据论著题名，不足以勾勒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之全貌。因此，必须借助文献学的理论方法（包括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等），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，方能将结论建立在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。

（三）学术史的方法

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，渊源有自。因此，必须借助学术史的研究方法，否则不能对他们的辨伪成就、学术地位及影响等，作出准确的评估与定位。对胡适、钱玄同、顾颉刚等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，仅仅勾稽出考辨文献多少，运用方法如何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因为比起上述这些，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到他们的考辨，因袭了什么，扬弃了什么，对中国文献辨伪学发展有何影响等。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，除非借助学术史的理论方法，否则不能实现。

（四）思想史的方法

汉唐以来，中国学者的文献辨伪，从来都不是对传世文献真伪的简单的、机械的甄别考辨。从某种意义上，其所主张的，比起其所考辨的，更值得关注。因此，笔者的一贯主张是“没有无思想的学术研究，同样也没有无思想的文献辨伪”。在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研究中，同样存在这类现象。如许多研究者所言，顾颉刚等学者的文献辨伪暨古史考辨，旨在推翻旧权威、旧学术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反封建”。许多看似断然决然，甚至是草率武断的论说，若非借用思想史的理论方法，否则不足以参透其背后的思想主张。

（五）社会史的方法

近年来，社会史的理论方法，在中国史学界方兴未艾。人们普遍认识到，在诠释师承学派、学术分歧背后的人事纠葛等方面，社会史的理论方法，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优长。因此，民国时期文献辨伪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，譬如胡适与顾颉刚的“反目”等，除非借助社会史的理论方

法，否则难见真相。借助社会史的理论方法，能从另一个维度观察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的走向。

三 内容及创新

从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角度，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，全面审视民国时期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，揭示文献考辨背后的思想文化渊源，是既有研究中的薄弱环节，同时也是本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创新。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既非单纯的文献整理问题，也非单纯的学术思想问题。如何认识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，如何评估这场立意高远的文化“破坏”，如何接续这条已然断裂的文化传统，实在是一个严肃的世纪命题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但时至今日，仍未见有人真正从文献辨伪的角度，解读这个看似俗套的文献辨伪问题。

考察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，否则不足以得出较为真切的认识。在全面回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，本书分九章，对这个牵涉颇广、意蕴丰富的学术现象进行了系统探究。其中既有人物研究，也有学案研究；既有部类文献研究，也有代表论著研究。本书的篇章架构和内容，兼顾了人物与事件、专题与个案、纵向与横向、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。

从文献辨伪与时代变迁、社会发展、文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角度，探究民国学人，如何在文献辨伪活动中，实现思想和学术、传统和现代、继承与创新之间的互动与融合，从而推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进步。

透过具体的文化考察，我们发现，自汉唐以来，中国古代学者即有通过文献辨伪表达思想主张的传统。梁启超、胡适、钱玄同、顾颉刚、钱穆等学者的文献辨伪，看似“改弦更张”或“破旧立新”，但实际上，其旨趣、方法与古圣先贤并无二致。

只可惜整合古今、弥缝中西的任务太过宏大，加之梁先生垂垂老矣；胡先生国学根浅；钱先生意气太重；顾、钱等后起之秀又有待历练，人才的“青黄不接”，终究让这场显赫一时的“文化革命”半途而废，只留下